

山神凹的人住窑洞,现在窑洞里早已不住人了,圈羊。我要说的是若干年前回山神凹过年。雪下得再大,回家过年是不敢含糊的。那一年冬天,腊八年后开始下雪了,雪下了三天,下雪时有尖利的北风呼号,山里的雪被风拧成一疙瘩,沟壑里积了很厚,平坦的路面上雪忽起忽伏,树上挂着冰凌子,白花花的山野,太阳出来照不透,雪片和雪片叠得很实。我和父亲要赶在腊月二十三小时回到凹里。城里的班车通到一座叫黑虎岭的山脚下不走了,这样我们只能走着回。往山顶上爬时只见世界一派苍茫茫灰白,浮雪随风在路面上打旋儿,太阳照化的地方,枯疏干草和一些荆棘枝蔓在风中瑟瑟颤抖。父亲扛着很大的一个行李袋子,那里面装着过年割下的肉,还有凹里汉子抽的烟丝和一些零碎的东西要送给乡里人。那时候我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,母亲在我的辫梢上结了两朵粉绸子花,那辫子不时地在我低头走路时从肩头溜下来,当我一次次反手撩起时,父亲发狠地把两条辫子在我脖子后系了一个疙瘩。

回到山神凹时天黑透了。有一个山外进凹说书的盲人被大雪封在了凹里,他住在我小爷隔壁的邻居家,他叫拴鱼。我们进凹的时候狗开始叫,叫着叫着就哼哼上了,家里人知道是城里人回来了。小爷豁着牙笑着看大小两个黑影走进过年,暖炕烧得很热,一进窝我就爬上了炕,两条腿不像自己的了,重得没有了知觉,窑洞里的小奶奶四颗镂空金牙露出来,笑着边帮我捏腿边张罗着叫小爷炒肉。拴鱼走进来,两只塌落的眼窝不时地动着,他能准确捕捉到人声,虽然是盲人可看上去照样眉眼生

动。窑洞里的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沙发,炕是人们生活的舞台,进窝的人说话吃饭都坐在炕上,一铺炕有时候能放下七八个人。炕上铺一领羊毛黑毡,每到冬天,小爷都要剪羊毛擀毡。擀毡的主要工具是弹杖和一床木帘。弹杖用来反复均匀羊毛,如弹棉花的棉花客,弹杖被拉扯得“嗡嗡”响,好听极了。擀毡需要豆面,豆面有黏性,羊毛和豆面挽和在一起,怕虫蛀常

道具,鹤寿边(白鹤与各种寿字)、福寿边(佛手与桃或蝙蝠与寿字)、金玉满堂边(金鱼加水草水纹)等等,可谓百色百样。每套炕围画边道的繁简多寡不尽相同。同边道相配的还有几种适合形图案纹样,画在画空两旁的为“卡头”,设在第二组边道下面角隅处的称作“角云子”,这些图案都是“细炕围”的附加装饰,乡间有钱人才如此讲究。小爷家的炕墙上只简简单

九月霜降缝棉袄,十月立冬送寒衣。
寒冬腊月扫日气,一年岁月盖笑容。

那一年拴鱼就留在凹里过年。
年三十父亲砍回初一五更点的明火柴,也就是松柴,堆到院子里。凹里人说说笑笑,谁家的明火柴不小孩子就不停地加柴。夜里包饺子,包好的饺子在高梁簸子上一行行排着队,火上的水烧欢时饺子撒欢似的倾进了锅里。年三十守岁,小爷在各个神位前上香,祖宗也请了回来,请在中堂前,祖宗的牌位前摆放了年里丰盛的供品,小爷取来一杆牛皮鞭子放在供桌上点了香磕了头。初一五更天,山神凹是我们家第一个放开门炮,接着家家都点了捻子有了爆响。明火柴点燃了,满凹里明晃晃的,火光映照着凹里人过年的笑容。父亲拿了中堂上的牛皮鞭子走到大门外站到碾盘上,凹里的男男女女都站在碾盘周围,父亲张开了腕口,一条生命弧线炸开了。鞭声不沾尘土与落雪交融,凹里人觉得心开了,血沸了。明火柴点燃的劈啪声中,明火把院子燃得如同白昼,雪地被火光烤出了一个很大的圆。我用荆条穿了饺子在明火上烧,吃了明火烧的粮食能点亮心灯。拴鱼坐在碾盘上开始说书,红红的火苗舔着他幸福的脸膛,二胡响起的时候,拴鱼的说着“书情并茂”:“老少爷们儿娘子大娘姐哎——”

年,让乡间的人永远都有旺盛的生命精力,透过久远的时间和空间,曾经的场景蕴含着多少岁月美好,促我泪水盈眶。年里活泛的说书人一波三折的长音,多少年里年年都柔软着我的心肠。

我们坨里村儿有潘姓和翟姓两户人家,因了男当家的在春节时情绪特殊,我便将他俩常记不忘。

这个姓潘的人,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,住处就隔着一个井台儿。按老亲戚叫法,我称他“三表大爷”。

潘氏家门历代有墨底儿。他的父亲,人尊称“潘五先生”,懂医,教过私塾。鼻若悬胆,颌下长髯,颇显学问气。

我小的时候,就觉这三表大爷性格过于活泼。他走路,总像跳着似的,跟谁谁爱开玩笑。农村里的红白喜事,好张罗。到春节,常帮助街坊邻里有春秧。

他的个子略矮而眼大,面色红而细润,牙齿整齐亮洁,下巴颏儿光滑。在生产队做记工员,兼任出纳。他长大了一些,知道了他一个缺点:他与别人打赌,竟以“换媳妇”作条件,十分地荒唐无稽。

他的晦运,始于“造反有理”的时期。构成的罪状根源是:八路军攻打坨里地区炮楼,几名受伤战士被“白箍儿”抓获,示众后要枪杀。其中有一名重伤员,痛苦不堪,哀求围观者尽快地结束他生命。估摸这潘姓人当时也就20岁上下,看此人惨状,十分揪心,遂拿了看守人的枪,将伤员打死。

运动中,有人将此事揭发出来,他被定为了“历史反革命”。出纳,记工员都干不成了。全村的“四类分子”集中起来,由造反派的人看押着,去河滩打机井。不管他们偷懒不偷懒,只要造反派高兴,看准欺负的对象,就用带铜扣儿的皮带,狠狠抽打。“最新指示”来临,最使他们遭殃,脖子上吊着姓名打了红叉的牌子,大折度弯腰,面向群众低头认罪。会场群众高呼口号的时候,谁都可以上台打他们。

我这三表大爷在同类者中,表现不俗。不管谁下手有多重,他不吭一声,亮出一口白牙,回转身冲着打他的人嘻嘻乐。他的态度,对于打他的人产生了磁性和弹性反应。因此,他遭鞭打最多,身上新伤旧痕。

荒河滩上打机井,危险性很大,伤人的事极易发生,这耗费一年半载的工程,让“四类分子”们干完了,就遭了各自的厄运。分派活茬儿,多数是“掏茅房”。

这潘姓人,以苦为乐的精神很强。他劳动态度认真,经他掏过的厕所,不留一勺儿粪汤,几乎把粪坑的老底儿都舀上来。而且,连洒落在粪坑盖儿上的秽迹,他也用干草、树叶擦抹干净。

从没见过他苦过脸。去厚道人家,那户主见他辛苦,要跟他说说说话儿,他摆摆手,笑一笑,不言声儿,怕别人受牵累。

过春节了,全村面貌一新,喜气洋洋,一片灯光火海,他的家却十分凋零,门上不贴对子,炉火半灭,死屋凉炕。由于“阶级立场”禁锢人们头脑,没有人去他家拜年。

他的老伴儿万分凄苦,却又没有多言,怕说出的话再添烦闷,只可蹒跚坐炕角儿上,用被子捂着脚,发几声微弱叹息。

谁都想象不到,这潘姓人是什么举动——50多岁的他,就那么心甘情愿,跪在了潮湿的屋地上,连续给老伴儿磕了三个头,连续给老伴儿作了三个揖,嘴里还叨叨:大姐,我给你拜年啦!

一副孩童似的真容。
老伴儿一身抽搐,眼里闪着泪花儿。

……
另一户翟姓人家,属于南街第三生产队。男当家的,外号不雅,人称“气包子”,性格急躁,好生气。他夫妻未曾生育,中年时有个怪儿过继。我称呼他“四爷爷”。

此人体格强壮,有力气,一副“傻大个儿”的模样。不分冬夏,爱流清鼻涕。

春节时,家里冷清,他就去串门儿。
那一回,正赶上我家族的“四爷爷”一家人围拢着炕桌,吃年夜饭。

我这家人的“四爷爷”是个车把式,生育了7个孩子,与“五男二女”的彩头不同,他家是五女二男。人口多,挣工分儿的少,其伙食也不会多充裕。只是那现场气氛,让亲戚四爷深受刺激;这个孩子喊声“爸”,夹一口菜送到上口;那个孩子有力气,又斟满一盅酒,递给爸手里。尽管看着伙食不强,但那过日子的红火劲儿,比掬一座金山都舒适。

农民过日子,混的就是一个人气儿啊。
翟四爷爷遂坐不下去了,不顾情面挽留,一路甩着清鼻涕回了家。

家里,老伴儿已为他准备好了一桌酒席,并碗筷伺候。老伴儿催促他上炕,不料,他竟掀翻了炕桌,喘着粗气,冲老伴儿大吼:吃什么吃!有什么好吃的!吼过了,拽起棉被蒙了头,躺下身子“呜呜”地哭。

老伴儿吓得浑身哆嗦,不知如何安慰。
我这个乡亲翟四爷爷,干各种农活儿,都是一把好手。就因为膝下无子,在前人论事时缺少底气。

对待孩子他都很亲热。他卖力气在装队时,我去铁道边儿玩,他给我过一个白面馒头。那个解了我的馋,现在还觉特别香的馒头,让我记他,记了四五十年。

类似的情形,在我们村庄也有。我们东河,也有一户无子无女的人家。他家住北坡的村边儿,三间老土屋,院子里有一棵“鹰不落”脆枣儿树,枣儿结得非常密,也非常甜脆。不少老乡都吃过。我偷过没偷过,记不清了,但肯定的是,我对那棵树的枣儿产生过动心。

两个老人怕孩子爬树摔着,见有两三个男孩儿探头探脑朝院里张望,就招呼进来,主动给打枣儿。枣儿落了一地,让孩子随意吃。临走,还允许把兜儿装满。

春节时候,这样的人家愈显孤独。节日展开的胜景,会给他们带来巨大心理压力。生为农民,他们为新中国的农业奠基,付出了辛劳,然而,就因后继无人的命运,造成了他们在万家灯火腾欢之时,虽则倚身家园,一颗颗心间之心却无处可栖。

潘家三表大爷,翟家四爷爷,都相继过世多年了。我回老家,偶尔路过他们的老屋,总会扭过头去,望一望。

那些个在我年幼时疼过我,爱过我的乡亲,他们的面容,时常在我脑海里闪现。他们善良、单纯的人性,以及在强大势力压迫下表现出来的顺生生态,也常使我生发崇敬和怜惜。

年节,休憩时间于每个人都充裕。直可想一想自己的平生所为,在何处曾有缺失;想一想人世的淳良、乡间美好的东西。宁静时刻,会不会提醒自己的良知呢?——能够触及到这些,或许,也是一种年味儿吧。

那年那人

董华

爆竹声中一岁除

袁学骏

有朋友告诉我,河北省人大、政协“两会”上争论放鞭炮问题,看来过年要禁放鞭炮了。我说,中国人喜欢红春联,也喜欢有动静,要是过年静悄悄的,就更没有年味了。允许放鞭炮才几年呢,不能因为城市有雾霾就拿拿年节传统开刀。又过了几天,省报记者电话来访,也是问过年该不该放鞭炮。我简短地说:过大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,是千家万户一年团聚、团圆的佳期,也是中国人表达喜庆、吉祥和来年愿景的节点。放鞭炮、烟花和挂红灯、贴春联、贴福字、包饺子、炖鱼一样重要,不声不响的就不像过年了。

过年也是过瘾,放鞭炮便是男人男孩子的极大乐趣。我和弟弟是家中的“炮手”。年三十晚饭时,要点蜡上供放鞭炮,是酬谢神家保佑一年平安、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恩泽,也是迎接“天地十方真宰”到凡人家来享受人间烟火的人神相聚,天人合一,能庄重而欢乐吗?我们晋州城南不少村庄的习俗是,三十的包子,初一的饺子。母亲和二姐揭锅拾蒸包,父亲便一碗一碗地往神前送。放一磕碗一个头,又催我去放鞭炮,放完了再补充磕头。我便拿上一两挂小鞭炮,系到院里晾衣绳上,或挂在墙的木楔上,从灶堂拎个火儿一点,那鞭炮就叭叭叭地响起来。四邻八舍的各种鞭炮也此起彼伏,好像举行着放炮大赛,看谁家的炮更响。我家也买“二起”,也叫“二踢脚”。那是父亲放的炮,这炮打到天上很响。父亲总是敲完了神才亲自燃放,让我们躲到屋里去,至多在门口巴着舌头听耳朵响。

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,远处迎新新年的爆竹声就断断续续响起来,母亲就催我们快快起炕。在我们冀中有一条古老的对联:“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二年。”三十晚上是辞岁迎神,父亲要续香续蜡守岁。我们孩子家熬不住,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再被大人叫醒,一睁眼竟然是又一年了,又长一岁。我穿上新衣服,就准备放这新年的第一轮炮。敬了神,放完鞭炮,大人们就去各家拜年,我和弟弟就借着神前烛光和灯笼的亮光,低头寻找了捻或崩掉了的落地炮。

我们那里初一吃了饺子要去上坟祭奠。这也是要大放鞭炮的,似乎炮声能唤醒祖灵,受到震撼也便振奋,家族后代也会更高兴的。我们冀中人多,各户带去的炮又多又杂,主要是“二起”。一种是连体的,头一响和第二响都装在一个搓好的筒里,两头用胶泥确实封好,下方有炮捻伸出来,便于点燃。另一种是分体的,下端头一响是个火药包,上端第二响才是纸筒的。东院的狗头哥告诉我,这个火药包包裹装药,放木炭多,能把上节打几十丈高,上节装的是横药,能在天上崩得很碎也很响。我见大人们把这鞭炮装进铁管炮筒里,按手指有插二插三的粗细不同,一放都是惊天动地,亚赛春雷,我们就叫它“挂雷音的”。在三九四九的隆冬旷野中,小鞭炮叭叭叭没有威力,只有“大儿柳”才能震天撼地。我长到十五六岁,父亲才允许我点“小二起”。我胆子不大,点着一个就跪,听身后“咚”的一声巨响,心中一惊,然后赶紧仰头,看天上燃放一朵火花,同时“嘎吱”声传来,我便有一种成功感了。

后来读书多了,才知道北宋王安石有一首古诗《元日》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也知道古人过年曾经点火烧毛竹,竹节噼噼啪啪地响,以为这样可以驱除邪祟保平安。后来有了火药,才制造鞭炮代替了竹子,但仍然保留着雅名“爆竹”,并且创造出了许多烟花。元代钟嗣成的小令《四时佳兴·冬》:“谢天公,庆时丰,烧残爆竹一年终。万物静观皆自得,四时佳兴与人同。”这也是一首民俗风情曲,充满着气象与希望。古代过年也有烧钱活动,就是点燃香木、木草等以助阳气上升。有的是烧松柏枝,叫烧松盆。还把一些旧东西烧掉以去秽气。我们冀中一带是正月初十或十一过老鼠节,烧柏灵枝和柴草,并把破扫帚、旧鞋袜等扔进火里烧掉。

我脑中一直琢磨着省报记者的提问,便给记者打电话补充说,什么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,但不能因此就动不动地禁传统。传统要继承,这也是民族的软实力、凝聚力,但方式上要与时俱进。要提倡限放限排,减放减露。建议城市各社区费点心,统一采购鞭炮,统一安排适合的地点,统一培训炮手,讲究燃放技巧。在过年时,集中燃放,让市民们在四周或楼窗里观赏。这样就大大减少了鞭炮崩伤、噪音和烟气太大的问题,也保护传承了春节习俗,让人们得到应有的文化享受,振作人们的精神气。并且,青少年们听听鞭炮,心理承受能力也会增强的。再者说,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,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,春节早就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之中了,不保护行吗?不要一会儿禁、一会儿放,要定个制度,最好按《非遗保护法》定个条例。我这样说心里也明白,那些有钱有瘾的炮迷们会不高兴,但放炮习惯是该改一改了。不能噤声哑气地迎春,要传承春节的重要符号,而且要更理智、科学,也更人文化、人性化地迎春。相信春神骑马而来,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新年的好运。

回山神凹过年

葛水平

要熬一些花椒水搅拌在一起。木帘用来铺羊毛,而主要的工序全是脚踩手揉。擀一领毡要用两个汉子三天时间,擀毡的日子大多是在腊月天,人闲了,炕也要过年,铺一炕新毡等于给炕穿了一件新衣。我看到小爷的窑炕靠墙的一面新换了炕腰围子,故乡人叫“炕墙画”。会画炕腰围子的油匠在乡间很吃香。炕腰围子的造型艺术形式,是壁画、建筑彩绘、年画的复合体。躺在炕上脸朝炕墙,看那月光下的美好,常常会觉得自己要融化进去了,整个夜晚的世界会在人睡前忘记贫穷。光说炕腰围子画的边道就很有讲究,常用的有:退色边、玉带边、竹节边、边棠边、冰竹梅边、卷书边、万字边、狮子滚绣球边、富贵不断头边、暗八仙边(八仙手持的

单地画边道,内里几朵富贵牡丹。不过今年小爷家的炕墙画换了戏曲故事“莺莺听琴”。“小红低唱我吹箫”的幽幽怨怨似乎更适合生殖的热炕。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,万物负阴而抱阳”,炕上的岁月是一个家族的红火。

父亲从隔壁邻居家给拴鱼拿来他的家什要他说两句书。拴鱼也不拒绝,坐在灶火前的凳子上拉着二胡开始了。
国正天心顺 官清民自安
妻和夫祸少 子孝父心宽——
腊月里得过年,二月里是惊蛰。
三月谷雨忙春耕,四月立夏是小满。
五月初六是芒种,六月日晒小麦黄。
七月白露祭大暑,八月寒露是中秋。



对远在江西井冈山山下那个乡下的家,我总有一份深深的内疚。1992年4月,父亲早逝,8月,高中毕业的我,抱着“誓死要离开痛得直不起腰的土地”,只身闯荡到广西南宁,留下母亲一人,独守那幢147平米的土坯房子。

从此,母亲和那幢土房子,便是我远在异乡日夜思念和挂牵的家了。

童年时,作为独生子的我,除了吃饭睡觉,大部分时间是往野外跑,跑累了,跑饿了,才懒懒地走进母亲的眠宿;上学后,我也很少在家看书、写字,总是背着书包到山头上,择一块巨石,摊开课本,铺上作业簿,静静地看起来或写起来。那时我想:家,只是限制自由的一只笼子罢了。

直到我背起行囊,即将走进大都市的那天凌晨,母亲默默地从神龛上拿起一挂鞭炮,流着泪准备点响,为我送行时,我才强烈地意识到家的存在。鞭炮炸得轰天响,我的心翻江倒海,无言的视线,把我和母亲拉成了千里之距。

记得离开家后的第一个春节,我终于踏上了家乡熟悉的土地。走到村口,侧目看见母亲正在池塘边洗衣服,村里的小孩子一路追着我,喊着我的小名,许是听到了,母亲急急扭转头,然后停下,愣愣地看着我,手中的捶衣棍久久地停在半空……

路途

陈纸

终于,母亲揩了揩湿漉漉的手,一句话不说,把我迎进家中。家里仍是我当初走时的那样:亮堂堂,干干净净,整整齐齐。

我注意起母亲来,明显瘦了。“你瘦了,不是在那里没吃好?”母亲开口说的也是这句。

那一年,对于21岁前从未出过远门的我,算是第一次尝到了春节回家的万般滋味。我递给母亲500块钱,母亲微微一笑,说:“我哪花得了这么多,你存着以后娶老婆吧,在我家养养猪,还活得活自己。”

返城的那天,母亲对我说:“在外面不要牵牵挂挂想着家,没事就不要转来,浪费钱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初期,南宁到江西的方向,只有一趟火车,还是南宁到无锡的,年底,途经江西、湖南、浙江、江苏、上海诸省市的旅客,全要坐这趟车回家过年,每节车厢的超载率几乎是百分之三四百,往往在南宁上车时,即便买了座位票,也挤得找不到位置。那一年回南宁时,在樟树火车站上车,我用10块钱“贿赂”了车站工作人员,让他用警棍撬开车窗,将头钻进车厢里,才得以上了车。站直身体后,脚不着地,站在别人的脚上,身体跟着别人的身体晃悠悠,火车走走停停,一直到柳州,耗了20多个小时。

相同的寒冷,相同的拥挤,相同的劳累。每年春节,在往返老家前后有一周多的时间,都沉浸在担忧、无力、沮丧、恐惧的情绪中,难以自拔。可奇怪的是,每年春节,我总要回家,总想回家。

那些年,每次春节回家,我都对母亲说:跟我到南宁去住吧。母亲总是说:你现在没娶妻生子,我去城里做好了啥个?之后,工作忙了,有时除夕之夜也要值班,没有时间常回乡下的家里过年了。好在我终于结婚,而且有了儿子,再请母亲到城

里来,她就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了。

世纪之交那年,决定到南宁来之前,母亲想了六七天,临行前一晚,亲戚和村里邻居们来家里,左一言右一语地说着话,统一起来的意思只有一个,就是劝我母亲:不要再回来啦,回来做什么呀?你还嫌没够够田呀,城里的日子好过,你去享福。等下次回来,你就是来做客吧。

母亲与父亲奋斗了一辈子建起来的那幢土坯房,越来越远离母亲的视线。从此,它或许就成了母亲最大的牵挂。来到南宁后,每隔一两个星期,母亲就会打电话去老家,问我叔:房子有没有打开门通通风?挂在楼顶的被子有没有拿出来晒晒头?问完这些,放下电话,母亲还自言自语:家里下大雨多,那面墙恐怕怕倒了;床没人睡,老鼠可能天天晚上在上面打架呀……

母亲在南宁一住就是6年,我儿子小学毕业后,母亲开始一次次叮嘱:你们不要我,我要转去。而每次,我都以没时间为由,硬是将母亲的要求顶了回去。母亲便一个人站在阳台上,愣愣地发着呆,有几次,躲在被子下偷偷地抽泣。

后来,母亲时不时与我吵起来。2006年除夕之夜,母亲与孙子玩着玩着,突然生气了。吃了年夜饭,便早早去睡了,第二天,叫着喊着非要回江西老家。而且,给一位老乡打电话,叫他开车接他回家去住。母亲是真生气了,看来,她在城里过得很不开心,对我们也不满意,我知道,这次如果不送她回去她是万万不肯的。

过完年,我请了假,把母亲送回了乡下。我看着母亲将老屋的门轻轻推开,当时是清晨,粉红色的阳光暖暖的,随母亲的视线,缓缓地铺了进去,呈三角形的形状,照在墙角的一张锄头上,泛着粉糙糙的光。母亲把空房子和仅存的几样家具清洗、打扫了一下,住了进去。卧室里的那张床还在,我忽然看到,床榻上,挂着一把不鏽,还有一顶草帽。母亲说:镇邪的,我不想让他其他东西占了,没几年,我就要老在这上面了。

听了这话,陡然,我觉得母亲正同这老屋一样渐渐老去。老屋因母亲的重新入住,又填充进了灵魂。我知道,眼下的这个家,我恐怕一辈子都无法逃离与摆脱,它是我生命的根和脉。

源于一种复杂的原因,自从母亲回到乡下后,我再也没有在春节回过老家了。我不能原谅自己,也不敢回应别人的指责。这七八年中,我只有在每年的清明时回家看看。每次回去时,我都像个喜欢回忆的老人那样,到村口日益萧瑟的竹林里,儿时疯狂的山上、曾经躬身耕作的田野、供养母亲口食的菜园去看看。我预想着,今年春节,无论如何,要回一次母亲乡下的那个家。

母亲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顽疾,医生曾说,那么年纪的人,医好很难了,只能通过服药缓解症状。我预备了一些药,希望能消遣一位将近70岁的老人长年难眠的隐痛;母亲的眼力不好了,我要预备一部老人手机,那种数字大大的,按键粗粗的,功能简简单单的,我希望能在这城里与乡下的家中连起一根“专线”,牵连起千里的路和日夜的思念;母亲不喜欢吃那些装在袋里的、干巴巴的年货,那就为她预备一个红包吧,让她想吃什么就买什么。

预备在老家短短的三四天里,首先要去拜祭一下父亲,把他坟头的蒿草拔光;接着,还想去邻居家坐坐,听听母亲平时跟他们讲了什么真心话;再到舅舅家去转转,去接受他们对一个不孝侄儿的批评;还要请伯父伯母、叔叔婶婶们吃个饭,感谢平时他们对我母亲的关照;当然,也不能忘了去叮嘱一下同辈的堂姐堂弟们,以后的日子,请常到我家老房子里,与我年迈的老母亲说说话……